

抗战时期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于文善◎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抗战时期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于文善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 于文善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161 - 2839 - 8

I. ①抗… II. ①于…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K09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607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 云 赵 丽
责任校对 刘小年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摘要

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对于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这一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在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这一问题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加上“史学变革”的影响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推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在时代使命感的推动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把握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这一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我们考察这一史学现象的前提。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史学理论建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从事史学研究时，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对各种错误史学观点的批判，重视历史主义的人物评价观和“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等。此外，史家还关注史学与现实的结合，将史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一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进步。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又一个主要领域是古代社会史研究。从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情况看，史家侯外庐的研究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史家吕振羽和吴泽的原始社会史和殷周奴隶社会史研究成就也突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真相被人所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呼应了当时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形态理论。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研究涉及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很多，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先秦诸子思想、明清哲学思想，涉及的史家主要有侯外庐、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和嵇文甫等，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颇具开创之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极大，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通史的撰述，这也是抗战时期诸多史家极力主张、追求的目标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第五章通过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观点、编写方法等的探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对比研究，论述了史家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贡献。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的重大事件，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和演变，既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抗战及其以后中国史学的走向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过度关注现实，“借古说今”等，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史学，以便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与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 重庆 学术中国化

Abstract

To study Marxism Historical Science in Chongq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o summarize and reflect 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Chinese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continue to cling to the guidance of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xism . Guided by the Marxism and by mean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c Theo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is article aims a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ing this period of Marxism Historical Science.

The origin of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lies in the rise of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social character and the debate on Social Hist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20 and 30 century in China, whose influence had being extended to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even later. With the influences of the reform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drive of the movement of Academic chinese,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appeared before us under the drive of the sense of time mission.

The main field involved in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ory . The Marxism historians at that tim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sisted on criticizing kinds of wrong reviews of historiography,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valuation of historic characters of Historicism an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ography reviews. Further more, the historians wer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ography and reality, connecting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needs of nations, which push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Historic Theory.

Another field involved in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s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Society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researches,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ian Hou Wailu is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Also, the historians Lv Zhengyu and Wu Ze's research on Primitive historiography and slave society historiography in Yin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stands out. Their research not only make people know the thread and truth of the ancient society of Chinese but also uncovers regul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echoing in with what Marx said "The East the historiography circle".

The third field involved in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It includes many fields, such as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pre-Qin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ir exponent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Ming-Qing Dynasties, including many important historians, such as Hou Wailu, Lv Zhengyu, Guo Moruo, Du Guoyang and Ji Wenpu ec. Their great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xism Historiography and is still an issue drawing much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world now.

The field involved in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s also the relation to a panorama of Chinese history .This research is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goals of many historian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rxism Historiography. By analysing the Framework System the main viewpoints the Method of Programming of Chinese history of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and by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Marxism historians and non-Marxism historian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historians' contributions to the Systematic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History of Marxism.

The producing and Developing of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s a great event in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nti-Japanese and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and also affects the trend and process of Chinese Historical Science. Of course , Chongqing Marxism

Historiography has its history limits, for example , the focus on reality and Talking about Past and Present was overdone. We should treat the historiography in a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way to push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Historiography .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抗战时期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时代使命	11
第一节 战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1
第二节 “学术中国化”与抗战时期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26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推进	42
第一节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建构	43
第二节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58
第三节 社会形态史理论的研讨	74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87
第一节 古代社会史研究溯源	87
第二节 侯外庐的“古典社会”研究	91
第三节 吕振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	99
第四节 吴泽的古代社会史研究	107
第四章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122
第一节 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	122
第二节 吕振羽与《中国政治思想史》	131
第三节 郭沫若、杜国庠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140
第四节 嵇文甫与晚明思想史研究	156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体系的构建	16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概述	166
第二节 通史研究中社会形态理论的构建	177
第三节 通史研究中历史发展动因论分析	182
第四节 通史研究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189
第五节 通史研究中的编撰方式问题	194
第六章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评述	20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200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反思	213
结 语	222
附 录：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著述目录	226
主要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50

绪 论

中国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功能。到了近代，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史学的这一功能日益凸现。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边疆史地研究，继之随进化论的传播而被维新派重视并运用的进化史观以及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思潮等，也都反映出这一特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历史时代的变化再次将国内的史学家推到了史学经世致用的风口浪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代中国史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正如有人所说的：“民族危机、国难当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把史笔变为刺向敌人的投枪，他们通过学术研究为革命事业和现实服务的努力，有力地配合了党的路线和策略。他们进行了扎实的且富有成效的史学研究工作。他们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如民族史、思想史、先秦诸子研究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①而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活动，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堪称史学在该时期发展的一个缩影，因而很值得我们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一 关于本专题研究的现状学术史回顾

关于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动，学术界已有不少相关的讨论。还在1941年，叶蠖生就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发表了《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一文，探讨了抗战开始后中国历史学的一般趋向，涉及抗战营垒中各学派的活动。同年11月20—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一文，也对抗战以来国内各史学流派的活动进行了

① 侯云灏：《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及其基本特点》，《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

概述。此后，郭沫若于1945年去苏联报告“战时中国历史研究”（后发表于1946年《中国学术》第1卷创刊号上），对近一两年来学术界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各个历史时代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成就进行了论述。胡绳于1946年《新文化半月刊》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也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各派史学进行了初步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中期，学术界围绕着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关联的中国古史分期等五朵金花^①问题的研究，兴起过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热潮。不过这一研究无法摆脱当时所具有的为意识形态语境所掩盖的史学研究困境。50年代中后期直至“文革”期间，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讨论一直被笼罩在“左”的政治思潮中，当然也很难对此开展真正学术史意义上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20世纪90年代后，出版了几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回顾和展望的著作。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按时间顺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其中第3编第6、第7、第8章论述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兼及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特点的叙述，如认为：“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批判法西斯史学理论和封建复古思潮，同时，深入开展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②陈启能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成就进行了评价。罗志田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辑录了蒋大椿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学者关

① 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间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这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指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古史分期问题即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曾经关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題，关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形态能否在中国实现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有助于我们比较科学地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把中国历史从特殊论、循环论等唯心主义泥坑中解救出来，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诬蔑我国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进步与发展的说法”。（王学典：《“五朵金花”论争的学术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4期。）农民战争史研究在于替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及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也都同样肩负有时代交付的意识形态使命。

②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278页。

于史学理论研究的成就进行了阐述。姜义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原因给予了关注。上述论著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此一时期，还有几篇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总结性的论文值得一提，如白寿彝的《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黎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尹达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林甘泉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瞿林东的《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戴逸的《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朱政惠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6期）。上述研究成果为本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史学概论、史学史的著作，部分内容也涉及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如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对抗战到来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积极的评价。赵吉惠主编的《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也有关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贡献的阐述。史学史论著方面，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对抗战时期的历史学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论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马金科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对此有所述及。

与此同时，有的学者还从史学观念、史学思潮、史学思想、史学流派的视角探讨了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关问题。如王学典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典范篇”，论及抗战时期的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认为：“抗战时期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以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所面临的特殊政治形势促使了这一时期唯物史观派史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①张书学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侯云灏的《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怀祺主编的《中国史

①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6页。

学思想通史》（近代后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黄敏兰的《百年学案·历史学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也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所探究。

新世纪来临后，有部分论著以抗战史学为题或从抗战时期史学的某种视角对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研究。

田亮著《抗战时期史学研究》第3章“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二·重庆篇”，对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吴泽和华岗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论述。不过该著的写作意图，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是把抗战时期主张抵抗的史家置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爱国主义史学范围中加以剖析、比较，以期获得对抗战史学有比较全面的认识”。^①洪认清著《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附录部分探讨了抗战时期史家和史学的学术主旨等，其目的在于彰显抗战时期延安史学的地位。

新时期也有一些论著涉及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个案研究，如谭洛非著《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谢保成著《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刘茂林、叶桂生著《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朱政惠著《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王学典著《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张传玺著《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部分纪念文集也进行了研究，如戴开柱编《吕振羽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北大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培平编《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

此外，德国学者罗梅君所著《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②也分析了20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但主要也是对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胡绳等人的个案研究。港台学者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剖析了史观学派的代表郭沫若、翦伯赞的史学研究，但其宗旨是“以历史门径叙各派新学术的发生、流变与兴衰”。^③

① 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序言》，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该著经孙立新翻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序言》，岳麓书社2003年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中国近代历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进程中的某一宏观研究上说，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至今尚未见到一部专门性的著作问世，而与之呼应的延安史学已有专著问世，这与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需要对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出现了几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专著。抗战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新中国成立后几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也有了专著。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二，从微观的个案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有关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现象的考察，大多散见于对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相关史家个案的研究成果中，如目前关于郭沫若的传记多达六七种，文集的出版多套，研究的文章更多。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的传记、评传、文集或纪念集也为数不少，文章数量也十分可观。而同属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序列的部分史学家如杜国庠、华岗、胡绳、嵇文甫、邓初民、吴泽等人，则缺乏足够的研究和重视。且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他们主要著作的研究上，而对于他们发表在报刊上的论文，学界显然注意得不够。因此，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应关注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之外的史学家的史学研究。

第三，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演变过程的讨论，人们关注较多的往往是其与政治及中国革命的关系，而对其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在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转向和成就，则讨论较少，以致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否认其学术上的价值。这种现象的存在，显然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面认识。因此，如何正确地把握历史主义的尺度，对其进行全面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评价，仍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面前的一项任务。

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把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特殊的学术群体和史学现象进行专题式的研究。这样做的意义在于：

首先，认真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机制、理论方法，

比较其分歧和共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近代史学的特征,认识史学和社会现实的双向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拓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军事的对抗是主要的。此外,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的较量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六十多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始终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学界用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各种层面对之加以研究,以期考察抗日战争对中国的重要影响。抗战时期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当时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一种真实的记录,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故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大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角度去拓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领域。

再次,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对于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当今,在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某种淡化甚至否定唯物史观的现象。应当看到,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学研究,在较长时间内为多数史家所坚持,并对中国史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失误和曲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唯物史观及其为历史研究作出的贡献。深入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并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应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

二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

本书研究的基本对象主要是抗战时期聚集于重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活动及其著述。当然,由于抗战形势的复杂性和文化学术活动的继承性,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含义或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重庆一隅或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活动,它实际上还包括抗战前和抗战后部分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活动,如吕振羽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虽然完成于战前的1937年2月,但这一研究与当时中国思想界思想文化的变动和日本侵华的背景有关。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虽然分别在战后的1947年、1946出版,但写作主要完

成于抗战时期。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初版于长沙，1939年修订出版于桂林，但在其后的国统区影响极大，翦伯赞之后也到了重庆，开始了在重庆的政治活动和史学研究生涯。胡绳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活动和史学研究也不仅局限于重庆一地。因此，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与这一研究有关的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及其相关学术的活动。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人数不少，各人史学研究所涉猎的领域也不尽相同，有的史家的史学研究兼及多个领域，涉及多方面的层次，由此增加了本书研究的难度。经思考，本书的研究思路大致如下：

首先是绪论部分。本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意义、学术史的回顾及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内容和方法等。著者拟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的论述，来揭示这一研究的必要性。通过对早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这一研究概况的追溯，来分析这一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作出一般性的阐述。

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六章。

第一章：抗战时期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时代使命。旨在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使命。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在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这一问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同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与进化史观指导下的“新史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其对中国传统史学带来的影响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这部分内容同时还就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延安史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推进。史学观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有学者据此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称为史观派。^①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从事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历史研究，尤其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持其他史观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进行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在论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他们还运用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上若干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与理论探讨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打破了传统史学研

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序言》，岳麓书社2003年版。